

K257.005.00

亨利魯斯

Henry R. Luce



亨利魯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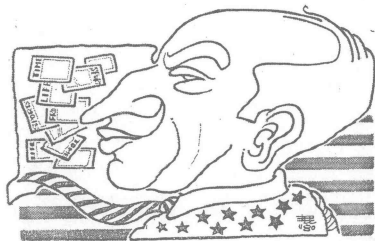
Henry R. Lu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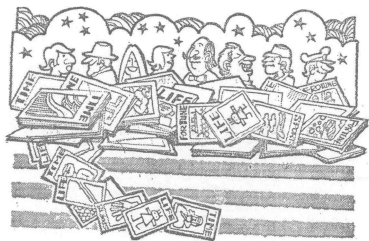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 39

亨利·魯斯

時代王國的領導者.....	五
「中國佬」魯斯.....	三三
與海登同進耶魯.....	四三
發行「時代」週刊.....	四六
別具一格的「時代」週刊.....	五五
痛失好伙伴.....	五七
步上嚴正優雅的坦途.....	五九
「財富」.....	六二
向廣播與電影界擴展.....	六九
巧遇美人兒.....	七四
飛躍的「生活」.....	一〇一
為正義而戰.....	一四



女參議員.....	一〇三
安之死.....	一二
憂慮而充滿愛心的家長.....	二二
信仰與偏見.....	二七
「時代」的一週.....	三〇
無法抗拒的「時代」.....	四〇
性情中人.....	一〇一
備忘錄.....	一〇二
父親的影響.....	一〇三
晉謁 蔣總統.....	一〇六
女外交官.....	一〇九
相敬如賓.....	一一一
「體育畫報」.....	一一四
永遠做個清教徒.....	一二四
後記.....	一二五
年譜.....	一二六



時代王國的領導者

有一次，一位電視記者問亨利·羅賓遜·魯斯，難道他不覺得擁有太大的權勢嗎？

「這個問題似乎非常抽象呢！」魯斯說。

「那裡，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你怎樣來度量權勢呢？你又不能把它拿來稱一稱看有多重。」

「可是你的確是大有權勢的，不是嗎？」

「嗯，我可不願說這是權勢？」

「也許把它說成是影響力和高層面的責任感還差不多。我想，把權勢和公家機關相聯結在一起，比較更能顯出權勢的意義。」

「不錯，」記者說，「不過你的那些雜誌可的確是影響著公家機關的。」

「嗯，如果你一定要這麼說，就算是這樣吧！」魯斯終於讓步了。

魯斯這番話實在很謙虛。如果衡量權勢的方法，是看一個人能影響多少心靈，那麼實在很少有人能以在野之身，像魯斯這位時代公司的創建人、公司主要股權擁有人兼總編輯那樣，支配着這樣大的權勢。在曼哈坦一座價值七千萬美元的大樓裏，百分之四十五為時代公司所有，在第三

十四樓，魯斯有一間雅靜的辦公室，室內最搶眼的是一幅整座牆壁大小的世界地圖，魯斯就在這兒，控制著影響千萬人心的事業。「時代」雜誌是魯斯事業的基石，它的發行數量達到兩百九十九萬份。其餘的期刊還包括有「生活」（七百萬份）、「體育畫報」（一百萬零五千份）、「財富」（四十萬份）、「建築論壇」（六萬兩千份），以及「屋與家」（十四萬份）。其中，「時代」與「生活」在約兩百個國家中發行的國際版，使得總發行數量達到一千三百萬份。（以上皆為一九六四年的統計資料。）

前芝加哥哥大校長羅勃特·哈金斯，在把魯斯對美國人的性格的影響與支出對美國人的性格的影響相互比較之後，下結論說：「魯斯先生的影響力是支大的二至二十五倍……我甚至可以说，魯斯先生和他的那些雜誌對美國人的性格所產生的影響，要比整個的教育系統加起來還要大。」

身為一個實業家，魯斯還有另外一個特徵，那就是，與他同一時代的美國人當中，只有少數人可能像他一樣靠著筆耕建立起這樣龐大的個人財富。時代公司一千八百萬股份裡，魯斯即擁有幾人能像他一樣靠著筆耕建立起這樣龐大的個人財富。時代公司一千八百萬股份裡，魯斯即擁有其中的百分之十六點六一，相當於大約四千三百萬美元，每年為他帶來超過一百二十五萬元的股息收入。

除了期刊之外，時代公司尚擁有以下的產業：一個郵購書籍的部門，這個部門，於一九六四年，在國內售出了八百萬本書，在國外售出了一百萬本；一個教科書的附屬部門（售出了六百萬本）；一個叫做「時代讀書計畫」的讀書俱樂部，擁有將近十萬人的訂戶；五家廣播電臺，六家電視臺，收聽、收看的人家達兩百五十萬戶；好幾家造紙廠、林地、油田、與各種各類的不動產。

一九六四年，在全美五百家最大的實業公司資產指南中，時代公司名列第一百五十七位，領先於像喬治亞·太平洋、菲爾波斯·道奇，和開瑟這些鉅子的事業。一九六四那一年，也是時代公司自開創以來獲利最豐的一年，時代公司共獲利一千四百二十萬四千美元。

但是，促使魯斯致力於改進自己國人的流品，並不是他的財富，也不是他個人的榮耀，而是他那種像傳教士一般的熱忱。就算不是人人所見與他略同吧，他却確實是把自己的影響力用在一個真誠的信念上，他以為他知道，什麼對自己的國人是好的。魯斯是個堅定的共和黨員，同時也是個虔誠的長老會教友，他是牧師的兒子，是個熱情、坦白、實事求是、無甚幽默感，有時還會感到自我的人，他以為美國應有其崇高的理想和命運，為了這個理想和命運，他可以說是殫精竭慮，不遺餘力。有一次，他對時代公司的主管們談起他在中國度過的童年，他說：「最初，我也許對美國抱有過於浪漫、過於理想化、完美化的想法，這倒不僅是因為美國從遠處看起來要比實際上的好，而且也與美國遍地黃金無關；事實上，從小到大，人們就教導我，美國要是有多麼毛病，那就是太多的人太有錢了，而富人們總是比其他的人們更容易犯罪。我的先人們在美國過了三百年，他們沒有金錢上的顧慮，雖然有時候還是很傑出的，但却從來沒有富有過。我對美國所以會持有一種理想、完美的看法，實在是出於和我一起長大的那些美國人，個個都是好人的緣故。」

他接著說：「那時，我以為大多數的美國人都是善良的基督徒（少數必然的壞蛋，像親娘行人的匪徒和坦馬尼協會的政客們除外），再加上把美國看成是個了不起的國家，人人都享有各種的機會，自由與公平，難免叫我產生一種理想式的，甚至於是不太切合實際的浪漫式的想法——

一種錯誤的浪漫式的想法。這種觀點下，我認為在根本上，人們並無性惡的弱點；人們很可以同時又善良、又富足，就算不是大富翁吧，也是有教養、充滿活力、富有進取心，且既重實際又兼顧精神地過著快快樂樂的生活。這裏，我並不是說美國的憧憬已經幻滅了，事實上，我的憧憬從未消滅過，我從來不曾對美國失去信心，而美國也未曾讓我失去信心。只是，我從成年開始，就對美國不太滿意。美國並不是如我所認知、所相信的那麼好的一個決決大國。」（坦馬尼協會是民主黨在紐約的一個有力的政治組織，創始於一七八九年。）

魯斯很少錯過星期日的教會禮拜，也不會忘記在睡前祈禱，他認為美國這個基督教國家頗有一些缺點，這些缺點使他憂心忡忡。他尊敬任何一個態度嚴謹的傳統宗教的教徒，不論他是長老會教友、羅馬天主教徒、東方猶太教徒、悲天憫人的單一神派教徒、末世天主教徒，還是猶太改革教徒。他在寫作和演說當中，常常提到上帝、聖經，與對美國的見解。他把美國的問題解釋為兩股主流滙合的產物——十八世紀法國個人自由主義和天主教融合的結果。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第三年，魯斯在聯合神學院發表演說時指出，儘管「美國不完全是個基督教國家」，而美國所面臨的待解決、待證明的，却是精神上與道德上的問題。他的觀念與當時的知識分子的看法大不相同；他堅持「美國人所以能够成功地、緊密地團結合作在一起，完全是由於美國的立憲精神是以上帝為依憑所致」。他接著說他有一種感覺，覺得在歷史上，除了古代的以色列之外，沒有一個國家像美國這般，很顯然是上帝為了祂的永恒目標，而特別授命的一個國度。（在其他的場合裏，他且宣稱共和黨正是代理執行上帝的永恒目標。）

那次演說之後不久，在南美以美教會大學的法學中心落成典禮上，魯斯又呼籲律師們：

「揚棄奧利佛·溫德爾·賀摩斯」，因為賀摩斯主張人的意義與狹狹或是一粒沙的意義不應有所不同，而事實上，一國之內大多數人的票決就可以戰勝所有的一切。這位法學大家的哲學是「現實主義、軍國政策、相對主義、未知主義、未知主義，還有一項——挑個最引人、最文明的字眼來說就是「大儒主義」。對於賀氏這套哲學，魯斯深表驚駭，並公開加以譴責。（未知論者相信除了物質外，其他的一切，即使是上帝，也都是不可知的。）

魯斯本身是個戰場，相互矛盾的各種論點，在這兒廬戰不休——他個人的倫理觀對抗著羣體的倫理觀，他的富有對抗著他對窮人的關懷，他在道德與宗教上的嚴謹對抗著他的自尊與自重，他那略爾文教派的基督教精神對抗著他事業成功的事實。談到他從事出版事業的早期奮鬥的情形，魯斯無限難過地說：「那個歹運女神就坐在外邊的辦公室裏等著我。」

就算是一國各部門的首長吧，也少有人像他那樣把自己和自己的職責看得那麼嚴肅而重要的。他行事的方式，就好像時代公司是美國國務院的一個延伸機構，或者美國國務院是時代公司的延伸機構似的。一九四〇年，他派遣第一位通訊員前往柏林，他的臨別贈言是：「你到了那裏之後，務必記得，你是僅次於美國大使的人。」一位董事會的董事對這個觀念支持得更為徹底，他以爲：「在總統和國會之後，時代公司就是美國最重要的機構。」

當南越的吳廷琰政府面臨日益嚴重的越共威脅之時，時代公司與國務院都贊成對越共加以痛剿，魯斯偶然遇見了從前曾爲他工作，而當時爲助理國務卿的舊日僚屬時，不禁說：「我看，我們兩個在越南都碰上了麻煩呢！」

「時代」週刊雖然位處國內，却儼然像個大國般地處理有關國內外事務的報導，因此，它很

少把通訊員從現場寄回的新聞報導直接付印。這些報導，必須先在「時代」的紐約總部經過一番考量，看看是否與魯斯的政策、決定一致。他們所召開的巨頭會議和所舉行的保屬午間會餐，真是像煞了由美國總統所召集的國家安全會議。編輯和執行編輯們，常會如國會議員那樣，匆匆地踏上旅途，以尋訪事實的真相。在這些高階層指揮人物當中，固然不乏睿智而有真知卓見的人士；可也難免有些阿斗之流，他們的干預往往只會徒增困擾。一九六三年，「時代」雜誌香港通訊員史坦利·卡諾返國探視，他的頂頭上司就不斷地問他：「誰能接替吳廷琰的政權？」他們似乎覺得，除非能够提出一個繼承者，否則就不該對這位處境已經十分艱難的統治者橫加批評。「時代」雜誌應該只限於報導這場戰事才對，而不是去訂定國家政策，卡諾說，這個上司可唬不住他。

一九五三年，魯斯訪問印尼回來，為一個編輯做了一份備忘錄，在裏面他寫道：「對於這個領土廣大的新國，坦白地說，我以為我們的政策應該如下：不要一定強迫他們怎麼樣，不論是錢財方面還是思想方面。印尼人對白人十分敏感、多疑，却又狂妄自大，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個性，所以，我們的態度應當是：對他們無所要求，也無所需求；他們若是想要我們甚麼東西，讓他們自己開口要。」

當然，我們和他們之間，應該固執地維持著外交的和和其他的關係，在所有的事情上面，有禮而又謹慎自制。我們有很多方法可以顯示我們對印尼人民和文化深感興趣、深感關懷，但是，我們和印尼政府及其各個政黨之間，却只能有公事往來的關係。

有些人也許會問：難道我們非得深切地關懷印尼不可嗎？難道我們不必像在別處那樣，在印

尼繼續我們的反共之戰嗎？難道我們不應繼續努力，以減輕印尼境內的不滿情緒，避免使共產主義有可乘之機嗎？我的答覆是，我們必需守住馬尼拉——西貢——新加坡這條陣線，要堅強有力地嚴守着，以對抗共產主義。果能如此，我們或可對印尼國內的問題，冒險地暫時聽其自然發展。」

在一九六三年的一份備忘錄裏，他寫道：「我希望你能對我們的南美洲的政策和南美洲的人們做一番徹底而有意義的研究。這裏的『我們』，我指的是美國政府和時代公司。」

一九六一年，魯斯把一個「重要的目標」交付時代公司，那就是擊敗世界各地的共產主義。在一次執行主管的餐會上，他問道：「這算不算是一種個人的宣戰呢？要算是的話，它會不會不合法或者根本是瘋狂的行爲？也許是這樣，然而個人的宣戰，却有好些重要的先例可援呢！」他舉出遠在西班牙的無敵艦隊之前，法蘭西斯·德瑞克爵士就曾與西班牙國王進行自己的海戰，並且說：「當然，我們時代公司現在無法像法蘭西斯·德瑞克那樣進行真正的戰事。（有些聽者還聽出了他語調裏透著遺憾。）德瑞克還有幾艘戰艦可資運用，不過由於伊麗莎白女王大幅度的削減，他所擁有的少數戰艦也只能算作是他私人的企業罷了。我們沒有船、沒有鎗、沒有砲，再說，這也不是一個海盜掠掠的時代。我們的時代不像十六世紀，我們的時代是個新聞事業的時代——至少在這新聞業的戰場上，我們還能盡點微薄之力。個人的戰爭嗎？不對，在這個有高度組織的時代裏，這個名詞已經過時了，但是組織裏的個人也不能坐著等政府去辦每件事情呀！我們國內的每個人和每個團體組織，爲了自由，都應該對共產主義迎頭痛擊，而且就在現在。」

在這個進步的時代裏，魯斯却像雕刻在大理石上的早期渡海殖民的教徒，顯露著一種淡薄的



魯斯。魯斯高瘦，下頷透著堅毅，他的脣薄，粗濃的眉毛之下，安著一雙不大、淺藍色的眼睛，看人的時候專注而情感內斂。他的手長而形狀美好，手背長著汗毛。他的頭頂已經光禿，原先長著紅髮地方的邊緣上，只留下幾撮稀疏的白髮。平常他臉上的表情總是堅定而叫人莫測高深；雖然患有重聽，却一直活到近世前幾年才肯配戴助聽器。你應該下定決心。使用助聽器，「一個和他一樣的重聽患者告訴他，「不過却要長時期的耐心才能習慣。」」耐心正是魯斯所欠缺的，他沒有聽從這個忠告，他說：「如果我周圍有十個人在說話，我能聽到，聽懂其中七個人所說的就夠了，另外三個人可能根本不值一聽。」他這麼想可是錯了。在俄國會議中，他常常把乙編輯所說的一些他不接受的論點，當成是甲編輯所說的，而對甲編輯大加責備。一次，一個時代公司的執行編輯反對另一個執行編輯的建議，說：「這個主意真是瘋狂。」魯斯只聽到最後一個字，隨口就說：「我並不瘋。」

他忙碌的思想常遠遠地跑在他的口舌之前，使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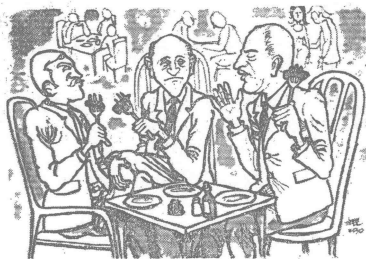
他的談話叫人難以聽懂。他的思想在剛開始的時候，也許是完整而有力的，可是却常常在匆忙之中傾倒出來，變成過於省略的一些片斷。他會從一句話跳到另外一句話上面去，然後又回到原來的話頭上，重覆再說一次；或是陷入令人不解的沈默當中，然後再拾起一個新的話題。他有個擾人的習慣，遇到有人述說一個他不熟悉，或是讓他吃驚的事情的時候，他就會大聲地問「甚麼？甚麼？」他小的時候就有口吃的毛病，只要是碰上他激動或是生氣來時（他的脾氣十分躁急）他的舌頭就會打結。

與其說魯斯在與人交談，倒不如說他是在講演，除非他講完，他的聽眾休想插進去說一句話。他不愛閑聊賸扯，雖偶爾會說上一兩句乏味的俗語，却難得說笑話。一旦他要說起笑話來，這個笑話往往就變得平淡無奇，他會不斷地重覆述說，竭力地解釋可笑之處。他開始了一個話題之後，總是不知如何在自己和聽眾感到厭煩之前快快把話說完。

一天，魯斯和溫沙公爵共進午餐，話題不知怎麼轉到了烹飪的技巧上面，這個題目是兩個人都很關心的。一位「生活」雜誌的編輯當時在場，回憶說：「這段不忍卒聽的對話，就這麼結結巴巴、順三到四地，說了整整第一道菜的時間。」

在公司的慶祝活動當中，魯斯有時也賣力地想成為「哥兒們中的一分子」，却總是不自然的走了樣。譬如在編輯部和營業部之間一年一度的棒球賽當中，他的表現就真是慘不忍睹。他充當一名捕手，可是他卻不斷地述說著當個捕手是多麼好、多麼有趣的事，就像個禁酒的人，在縱酒狂歡宴上，帶著犯罪的心情，不斷地遊說自己，希望能夠減輕心理的負擔一樣。

魯斯擁有高位、財富，行踪遍及世界各地，認識許多大人物，又曾經在哈區基斯學校、耶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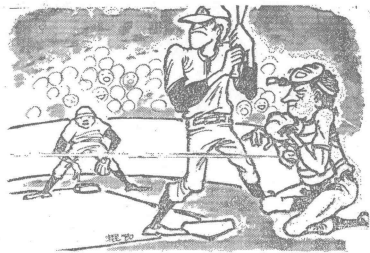
深以為苦了。他們把這種情況，一部分歸諸於他強烈的偏見，一部分歸諸於他從小生長於喀爾文教徒禁慾的傳統環境當中。

一天，魯斯召來「生活」雜誌的總編輯約翰·蕭·畢令司，以及公司裏的一個作家林肯·巴尼特，在華道夫飯店進午餐。

「畢令司令我心寒，而魯斯又令畢令司心寒。」巴尼特回憶著說。

侍者問他們可要雞尾酒，由於魯斯不要，所以畢令司和巴尼特雖然渴望來上幾杯，也只好不要。他們都已饑腸饉餓，而菜單上也列了許多的美味。魯斯點了法蘭克福特臘腸和青豆，畢令司和巴尼特也依樣畫葫蘆。

魯斯切下一小片臘腸，舉到嘴邊，却又放下來，說：「關於那套糞雷……」畢令司和巴尼特不得不停下來，好聽他說話、回答他。這樣的情況一再的重演，終此一餐，他們兩人好不容易才撈到了兩口。回到辦公室，巴尼特謝過了魯斯的款待後，就一頭栽



大學、牛津大學受過教育，然而他展現出來的社交技巧却差得叫人吃驚。不管他是主還是客，他總是喜歡聽著自己的手錶，雙腳還不停拍打著地面。假使衆人的談話無甚高潮，魯斯很快就會分心，也不管別人仍在喝咖啡，他就毫不猶豫的從餐桌站起身來。他老會忘了把鹽和胡椒傳給人家，也不會記得看看是否每人的酒杯都是滿的。他自己喜歡舊式的習俗、舊式的東西，但一晚上却喝不過兩、三杯酒（「我恐怕會醉得像魯斯一樣了。」是公司同仁相互取笑的俏皮話之一），在正常情形之下，他白天裏是滴酒不沾的。魯斯抽煙不斷，儘管常年咳嗽不止，却總是戒不掉，而且常心不在焉地順手抓起眼前的火柴和香煙便抽。有一次在香港，美國的一位外交官爲他舉行宴會，宴會正進行當中，他竟看看手錶，宣佈說：「該走了。」這個外交官於是說：「大老闆說時間到了，該走了。」宴會因此終止，每個人只好離去。

魯斯雖然對口腹的享受不反對，卻不是個重視個中滋味的人，他的員工中有些美食主義者，就不免要

這對街的自助餐館去了。

另一次，因為想在午飯之時和「生活」雜誌的編輯奧利佛·金生商討一篇文章，魯斯派遣他前去附近的路易十四酒店爲兩人點菜。經過幾番仔細思量之後，金生選了特別淡的馬丁尼酒及馬格利肉片。魯斯半個鐘頭之後抵達，一口喝下了飲料，就開始狼吞虎嚥起來。

「希望你喜歡我點的菜。」金生說。

「只不過是加油而已，」魯斯說，「只是油，只是油！」

有一回，一夥巴黎辦事處的同仁，帶他前往著名的海鮮店，一位叫梅迪特瑞尼的，事先點好了一道多種魚肉共煮的菜。當驕傲的店東，把香味四溢的深濃端上桌來的時候，魯斯開了開說：「魚湯呀，不要，拿走吧！」

這個店東看來真是泫然欲泣了。請魯斯客的人解釋說，這道菜是特別爲他準備的。

「好吧！」他說，「那就給我來一點，管他是甚麼鬼東西。」

在另外一家巴黎的大飯店裏，他問店東說：「這裏有甚麼好吃的嗎？」

「當然，先生，」這位滿腹不悅的餐飲界要人回答說，「我們的橘汁鴨是評價很高的一道菜。」

「那不就是鴨子煮橘子嗎？好，就給我來一份，不過用蘋果醬煮吧！」

魯斯辦公室裏華麗的程度，遠遠於他的一些主管們。少數幾件昂貴的裝飾，緩和了辦公室裏嚴肅的氣氛。有一座魯斯本人的半身銅像，還是魯斯夫人請請·戴維生爲他做的。還有一幅溫斯頓·邱吉爾所作的田園風景畫，這是魯斯在這位英國首相在查特威爾的鄉村別墅中作客時得到

的。（邱吉爾讓他在畫室裏任選一幅，魯斯說，他想要一幅查特威爾的田園畫。邱吉爾問他不要羊，魯斯說要，可是這位畫家找來找去却找不到一張有羊的，所以就畫了一羣。）另外還有一幅長方形的漆畫，是吳廷琰總統送他的禮物，畫的是一叢竹子，根據題款，竹子在越南的藝術和文學領域裏，代表著正義。此外還有一幅中國鄧州的一座佛寺的圖畫，那是魯斯的出生地。他的桌子旁邊有張太太的照片，上面寫著：「給我親愛的和禮。」

由於是略爾文教授，魯斯在個人的習慣上十分儉省簡樸，外人看來，倒像是他刻意誇大故作似的。「時代」週刊的支加哥辦事處，有一次爲他在黑石旅舍訂了一間套房，好讓他能在那裏換上晚宴的衣服，去參加一個政治性的酒宴，也不管他是否計畫在宴後即刻離城。他在聽說那間套房要花五十四塊錢的時候，不禁抱怨說：「老天哪！我難道就不能在廁所裏換嗎？」

在搭乘電梯前往辦公室去之時，爲了跟員工們打招呼，而不得不中斷連貫的思緒的情況，很使魯斯感到苦惱，因此，一條不成文法施行了有數年之久，那就是：電梯裏若載著魯斯，誰也不進去。一天早上很早的時候，一個年輕的職員，不瞭解魯斯所嫌惡的這件事情，他走進大廳，看見魯斯正在電梯旁等著，不耐地搖動著公事包，從著兩肩，帽子低低的壓在前額上。

「魯斯先生，您早。」這個職員說完又另外加了一句：「我是瑟雷爾·都爾門。」

魯斯根本就不記得這個名字，點點頭說：「哦，是，你是瑟雷爾。」

一架電梯的門開了，魯斯走了進去，都爾門在後也難堪地跟進。

「第二十四樓。」都爾門對電梯操作員說。

魯斯冷淡地擰了他一眼說：「我們是要一直上去的，不過，你要和我一道搭電梯也行。」然



時代之國王與總統

後，又突然問：「本週你在做些甚麼事？」

電梯抵達主管樓的時候，魯斯踏著大步而出，而都爾門猶兀自解說不已。「魯斯先生，再會，真高興與你。」他只有怯懦地在他背後喊著。

在電梯下行之時，電梯操作員雙臂交抱，往後靠在門上，無限同情地搖頭說：「老兄啊，你完了，最好是拿了薪水就走路吧。」

「你這是什麼意思？」都爾門問。

「難道就沒有人曾經告訴你，當那個人走進電梯裏去的時候，你應該轉身就走嗎？」

都爾門把自己的失態向直屬長官詹姆士·薛普利述說。「我比你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呢！」薛普利告訴他。

原來，有天傍晚，薛和他的女研究員一起離開去用晚飯，想要討論一篇報導。在走廊上，薛普利發現遺忘了文件，就叫她把電梯停在那兒，自己跑回辦公室去拿。等他回來，竟發現研究員的一隻腳在電梯裏，而魯斯赫然出現在電梯裏面敲著手指，不停地問：「我們怎麼還不走？我們怎麼還不走？」

「你曉得我怎麼辦嗎？」薛普利告訴都爾門說：「我就這麼一直走過去，因為，我知道，那個女孩仍在那裏等我。」薛普利後來成為「時代」雜誌的發行人，都爾門也成為多倫多辦事處的主管。而這時，魯斯也已克服了他那不願與人共乘電梯的毛病，他終於想通那是民主的。

魯斯和他的夫人一有時間，可以休閒一下的時候，多半是在畢特摩爾區四十三號的別墅裏度過。這是他們在亞歷桑那州的鳳凰城裏的一所別館，是他們自一九三五年婚後所住過的許多房屋

之一。他們的第一所房產，是一座七千公畝的農場，在南卡羅萊那州的梅普金。他們後來將這所農莊捐給了屈匹斯特特倫人的修道院（譯者按：屬於 Cistercian 教派，一〇九八年創於法國，教士們生活嚴肅簡樸，好持久沉思），因為這個教會的一位作家，托瑪斯·梅登神父對他們說，這座農莊是個理想的修道院所在。（屈匹斯特特倫們對閱讀資料有嚴格的限制，但梅普金的聖母瑪利亞修道院，可能是唯一定期公開《時代》與《生活》雜誌的教院。）婚後初期，魯斯和太太有時住在華爾道夫大樓第四十一層的套房裏，有時則住在康乃狄格州的史坦佛，一棟租來的房子裏。後來，他們在西五十二街的利弗大廈裏，有一間曼哈坦公寓；在康乃狄格州的利基弗爾德有一棟房子；在紐約第五街九三號有一個公寓；還有就是鳳凰城的別墅以及，夏威夷的一座海濱庭園。

就一個家財萬貫的富翁來說，這些產業並無特殊之處，不過裝飾着這些房產的那些稀有、昂貴的物品，却可顯出魯斯夫人的鑑賞力。對於繪畫，魯斯還算是個頗具鑑賞力的收藏家（他是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董事之一），但是除了繪畫之外，魯斯對他週遇的事物及環境却少有興趣。他並不貪得無厭，如有甚麼事情使他感到困窘的話，那大概就是他的隨身財富與權勢當中吧！根據喀爾文教的宿命論，物質上的成功並不危害到「神所揀選的人」的靈魂，遇上與否，全憑上帝的意旨；就另一方面而言，成功並不是要讓神的選民去享受或是狂歡，成功並不意味著上帝就一定讚賞他個人的努力成就，成功只預示他可以被上帝選上。

魯斯在鳳凰城的產業，包括了一棟長形的一樓平房，一間馬舍，一座仙人掌園，及一座溫水游泳池，它的內院與亞歷桑那畢特摩爾酒店的高爾夫球場相鄰，使得魯斯能輕易地聽從醫生的指

示多做運動。他每天至少要打九個洞，這是很稀鬆平常的，不過他擊球却很少能够低於中間標準四十桿。他沒有耐心在球場上走，所以開著一部高爾夫球車。魯斯太太則專注於寫作，或者她許多藝術嗜好當中的一項，包括鑲嵌壁畫。午餐之前，這對夫婦在溫水池裏會面，兩人都戴著泳帽，他們從淺的那頭下水，然後上上下下，慢慢地側泳著，邊游邊低聲地交談。

偶爾，魯斯夫婦會與他們富有的鄰人們打打橋牌，做為晚飯後的消遣。橋牌職業專家查爾斯·葛仁，是「體育畫報」的撰稿人之一，他經常是魯斯家中的座上佳賓。魯斯到晚年才打橋牌，而且還是由於太太的慫恿才打的。有一天，魯斯夫人塞了一本葛仁的書到他手裏，並且宣稱：「明天我們要打橋牌，今天晚上看書吧！」可是他從來也沒有把橋牌學好，因為，他的腦子總會轉移到其他較重要的事情上去，也因此，他永遠只愛紙牌遊戲而已。魯斯不贊成賭博，所以他把賭注限於四分之一分錢。有個比他還富的對手，一次輸了十塊錢，滔滔不絕地發牢騷，魯斯就說：「就憑十塊錢，你能到那兒吃比這裏更好的飯呀？」

在鳳凰城時，魯斯也像在別處時一樣，或者僕僕風塵於路上，或者發表演說。他總是勤奮工作，而不太注重遊樂。他在臥室裏擺了張書桌，每日以電話或備忘錄與紐約聯絡。

魯斯最特出的天賦，是他的好奇、一種對時間的敏感的本能，和先知先覺。這三樣的結合，遂使得他的雜誌能够恰當的領先讀者，使讀者覺得我心中有感焉，却不會超前過頭，而讓讀者困惑。很多刊物喜歡做讀者調查，以訂定方針，魯斯却不信這一套。一九四五年，他齊集手下的編輯，討論對於未來的聯合國應該採行什麼樣的政策。威廉·史朗，一個奧地利後裔，是他屬下智囊之一，反對支持聯合國，理由是：「聯合國若容納蘇俄，蘇俄定然會反對它的崇高完美的原

則，而聯合國便將因此注定了要失敗。」魯斯於是請大家舉手表決，贊成史朗的，就只有史朗一個人。魯斯後來私下對他說：「我希望你瞭解，威利，我不得不擱置你的意見。我曉得你也許是對的，十年的時光大概可以證明你的看法，可是一個編輯的職務，是領先讀者三週，而不是十年呀！」

不過，史朗並不懷疑魯斯這個論點不是善意的。「若一個人，尤其是一個虔誠的喀爾文教徒，相信成功是做爲上帝選民的神聖要件，他是不會有惡意的，」史朗說，「他接受每件事實，認爲那是上帝的意旨，包括必須做個好編輯，並和讀者們相互協調。」

有人認爲魯斯是個十分有理性的人，是個標準的右派人士，但是他的行事方針有時却叫人百思不解。他雖然天生是個保守主義者，卻有個獨立有主見的腦子，常引發他一些不合常態的論點。一九二八年，他竟出人意外地支持艾爾·史密斯競選總統，以對抗赫伯特·胡佛，因爲他覺得史密斯具有真正進取的精神，同時也贊成他反禁酒的立場。

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掌權人士大多是孤立主義者。然而，魯斯在戰爭初期，即已認清希特勒的邪惡，明白美國將無可避免地介入受希特勒威脅的歐洲的事務。歐戰勝利之後，在樂觀主義的光芒裏，大多數的美國人，覺得蘇俄似乎不是甚麼威脅，可是魯斯却意識到共產黨威脅的本質，爲了提出嚴防共產主義的警告，他還受到自由主義人士的譴伐，事實上，他們指控他是叛逆。數年之後，他又意識到另一種形態的危險，那就是參議員約瑟夫·馬卡提所表現的極端偏右的態度。在魯斯的觀念裏，國際共產主義已不再是個嚴重的威脅，而馬卡提的強烈態度，反而會削減了對抗國際共產主義的真正危機的力量。一九五一年，九月十日，他給『生活』雜誌的社論撰

稿人做了一個備忘錄，他寫道：「現在是狠狠地抨擊馬卡提主義的時候了，不過我們的目標一定要對準，我們大致的主張是：凡是我們覺得有毛病的事情，都歸罪於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已經成了代罪羔羊。可是事實上，在美國，即使在間接方面，共產主義也不再是個真正的問題。在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時代，共產主義曾是一種羞恥，也確實是種羞恥，可是現在已經不是了……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〇年之間，反共產主義的確發揮了許多效用，甚至連嚴肅的宗教，也裝模作樣地藉反共產主義而大做文章。然而反共產主義，現在氣數已盡，無甚大用了，在美國，它已變成一種虛偽的幌子，只對新聞界人士與其他的領袖們有用而已。」於是魯斯的那些雜誌便對馬卡提猛烈地抨擊。

魯斯在自由陣營裏，曾爲許多民權問題奮鬥，特別是種族隔離的問題，他覺得唯有如此，才與基督教的教義相符合。一九四六年，通用汽車公司底特律廠發生工人罷工事件。魯斯深深同情廠方，然而，他却在一項陳情書上簽名，這項陳情書是由一個委員會所傳發的，爲的是要協助罷工者的家庭，並捐款給救濟基金會。「我覺得饑餓不該拿來做爲武器。」他說。當紐約報業公會組織了一個「時代小組」之時，他並未顯出敵對的態度，只是笑著開說：「我不是也能加入呀？」

政治評論作家理查·羅維，在對美國政府做一番嚴苛的分析之時，考慮到要把魯斯和『時代』雜誌放在甚麼樣一個地位，却發現他只能下結論說魯斯和『時代』根本就不屬於美國政府。他說：「它（『時代』雜誌）常攻擊政府的論點，不留餘地，同時對許多政府官員們也極端的無禮，甚至還可以說是惡劣。美國政府對於『時代』十分膽寒，當然，她有時很想設法跟『時代』妥

協，方法是請亨利·魯斯參加個甚麼委員會或其他甚麼的……或者是給他老婆一個甚麼政治性的職位。不過，魯斯的出版事業，大體說來，應該算是超乎政府之外的。」

魯斯雖不特別學富五車，也並不對美學的經驗有很深刻的反應，但却有一種幾乎絕對不出錯的直覺，能够感覺得出何種新的心智和藝術方面的思想，將會刺激人心，具有深意和影響力。他是個善於製造鑑賞力的人，他預期美國文化的擴展，將是人們休閒時間增加的结果，因此他的雜誌，便對藝術和科學做更深入的探索。魯斯精神內的老師兼教士成分，渴望能够提升美國人的心智、品味和道德。「美國的心智的健康」是他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辭。

儘管魯斯經常十分唐突、脾氣死硬，對人對事的感覺反應遲鈍，甚至有時幾乎到了殘忍的地步，有很多很多的職員，包括許多在盛怒之下拂袖而去的人，却都承認他有著一份情感。一般說來，這種情感，並不是魯斯個人的溫情或魅力所激起的情感，而是藝術家對於自己行業裏的大師所產生的反應。

「你若喜愛新聞寫作，就不得不喜愛魯斯。」提阿多·懷特說。他曾是「時代」派駐在中國的通訊員，因為魯斯親、蔣介石的政策，而與魯斯開闊，可是過了幾年，他又讓步了，再度為「生活」雜誌撰稿。「他聰明絕頂，勇敢而能堅持己見，是個堅強的好鬥士，他奮戰就是為了要獲勝。你如果和他同一陣線，那他真是再慷慨不過了，不過他也是个威力強大的敵人。他以自己的道德尺度來約束自己，他那種堅定地支配人、專的態度，真無異是可以予人當頭棒喝的醒世奇人。只有一個像他那麼堅定、積極的人，才能對新聞事業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他革新了美國讀者的思想，他是個舉足輕重的美國人。」

「中國佬」魯斯

有一次，魯斯帶著一種不尋常的深思與自我坦白的心情對他的主管們說：「你們永遠也想不到，在我一生中，感到最遺憾的是甚麼，那就是，我從來沒有過，也無法擁有一個家鄉，一個美國的家鄉。『你是那裡人？你在那裡出生、長大？』這些是根本的問題。一般人很少了解到、注意到，而人類學家已經指出，這些問題對於美國與美國國內的人士，具有深刻與特殊的意義。前天，副總統巴克利說，他是肯塔基州人，所以不是個禁酒者，就這樣，他輕而易舉地便為自己解決了問題。瞧瞧，一個美國人總是能够很令人滿意地就說自己是打那來的——管他是紐約的人行道，還是伊利諾州的農場，或是德克薩斯州的休士頓。『你是那兒的人？』我真希望能夠簡單而隨意地說是『愛荷華州的奧斯卡魯沙』，用什麼交換都行。」

可是他卻只能說：「中國的登州。」他的雙親是來自賓夕法尼亞州，司克蘭頓城的傳教士，雖不富有，却有良好的社會關係。他的父親，亨利·溫特爾斯·魯斯牧師是耶魯大學一八九二年畢業的牧師，而父親的先祖，是十七世紀初期，麻塞諸塞州馬他爾福園的移民。魯斯的母親，伊麗莎白·露特·魯斯，婚前是女青年基督協會的工作者，她的歷代先人，曾是英國的地主、軍人、教士與公職人員。魯斯博士在登州一所初創立的基督教學院裡教授物理。山東省伸入黃海中，登州這個古老的港口，就位於它的海角上。老魯斯對於基金的募集很有辦法，他說服了好些美國長老會教友，出錢支持中國的兩所大學，並且努力地根據基督教民主的標準，改進中國的教育，中

國之再生爲一個現代化國家，老魯斯可以說功不可沒。老魯斯是個布爾·目斯共和黨員，雖然接受的是他那一代，毫不妥協的喀爾文教義的教誨，他本人却是個自由派的神學教士，他對於做好實際的工作，要比謹守傳統的方式，來得關心。他相信一些矛盾的基督教義，應有妥協的餘地；他瞭解佛教教義與東方哲學的價值；同時，他還樹立了一種新的傳教方式，強調藉著教育，可以使人改信基督。

亨利·羅賓遜生於一八九八年四月三日，他是四個孩子當中的長子，就生在教會所在的泥磚牆之後，由一位名叫卡爾文·馬提爾的牧師爲他施洗。根據習俗，外國人要接受與本名說音相近的中國名字，老魯斯的名字於是音譯爲三個中國字：「魯淑義」，最後兩個字的意思是「追尋正義」。亨利·魯斯在會說英文之前，跟著一個抽鴉片的女傭學說中文，於是他就成了「魯少義」，即小魯淑義的意思。

斯巴達式的嚴格教養方式，支配著他的兒童時期。他母親從登州教會寫信回國，形容家中的作息情況如下：

早上六點
六點半至七點
七點
七點四十至八點二十
八點半至十一點半
中午十二點

起床，洗冷水澡，穿衣。
研讀聖經。
早餐。
再讀點聖經。
學習中文。
午餐。

十二點四十至一點二十
一點半至四點半
四點四十至五點半
六點
晚上

午睡。
學習中文。
散步。
晚餐。
一般的閱讀並再學一點中文。

由於外國人剝削中國的資源，一九〇〇年六月，發生「拳匪之亂」，使得中國人對「洋鬼子」一壓抑已久的痛恨，整個爆發出來。那些恐怖分子自稱是「義和拳」，殺害了許多外國人士，其中有些是教士。魯斯一家人，現在又添了一個女兒艾瑪維兒，只好逃難。一艘中國砲艇海坪號，是由一些牧師們的中國友人薩銀平船長所指揮的。薩船長把砲艇駛入擠滿了船板的港口停靠，將魯斯一家人接上了船，同時，山東半島更東邊的煙台那兒，美國領事也派了一艘輪船來撤離美國國民。這艘輪船在六月三十日晚上進港，黎明之時，薩船長便把魯斯一家人送上了美國船，那兩個小孩是一個細板、一個細板地送上去的。

魯斯家人就在煙台的難民營裡度過了好幾週，飽受酷暑、擁擠與饑餓的煎熬。最後，他們和其他的教士，在一水之隔的韓國漢城，找到了避難所。次年秋天，歐洲八國聯軍平息了拳亂之後，他們又乘船返回登州。三年之後，又添了第二個女兒伊麗莎白，這時，他們遷往內陸臨近難縣的一個教會去。他們的第四個孩子雪頓（少鈴），九年之後在該地出生。

一九〇六年，魯斯一家首次休假回美國。老魯斯前往東部，去爲一所中國學院募款，魯斯母

子就在舊金山等著。老魯斯帶了一封介紹信，去拜訪友加哥一位很有希望的捐款人賽拉絲。馬可密夫人。這位夫人已過世的丈夫，曾發明收割機，並建立了國際收割機公司。對魯斯家而言，這次的會面有十分奧妙的結果，老魯斯夫人感覺到「那看不見的手……正依著神意操縱著我們的命運」。

當老魯斯走進座落在拉希街的馬可密克大廈之時，已是精疲力盡了，而且身上還帶著好幾種病。馬可密克夫人是個高貴的婦人，她參加亞伯罕·林肯總統的就職舞會時的少女時代美麗的痕跡，仍隱約可見。夫人在她的圖書室裡接見了這個牧師。

「和禮一直沒有搞清楚開始的談話是怎樣的，」老魯斯太太事後寫信給一個朋友這麼說。「可是却念念不忘她那無以倫比的神態——她的臉，因內在的光芒而發光；那雙美好的眼睛，充滿了熱情、勇氣與智慧；更重要的是，她眼裡流露出來的那種慈謫的神色，似乎解除了他心中的孤寂和一切未說出口的問題，轉而放在她自己的心上。」

經過幾分鐘的談話之後，馬可密克夫人打斷他的話頭：「你已經很累了，跟我來吧！」她帶他走過了走廊，來到一間套房裡。「這是我兒子的房間，可是他現在不在這裡，我希望你把它們當做自己的來用，我過希望你立刻上床睡覺，我會派人到你的旅館去取你的行李。到晚上的時候，我希望你，假如你願意的話，把你在中國的工作，全盤告訴我。」

其後不久，老魯斯太太帶著孩子們前來東部。她在旅館裡和丈夫會面的時候，馬可密克夫人的花，和邀請他們吃晚飯的請柬已經在那裡等著了。由於在遙遠的中國教會裡待了八年，老魯斯夫人不免對著自己衣櫥裡黯淡而過時的衣服感到苦惱不已。老魯斯設法安慰她，並向她保證說：

「妳等著吧，馬上就會明白的。」她把孩子們洗刷乾淨，又把他們的衣服刷淨，然後懷著顫抖的心情，前往拉希街。

魯斯一家人，在馬可密克夫人的客廳等著。亨利，這時八歲，站在窗邊，散漫地凝視著往來漂亮的馬車，兩個女孩子，則僵直地坐在沙發上，她們的腿太短，碰不到地。他們五個人，誰都忘不了那晚的事情。「夫人風度絕佳地走進了客廳，她的兩臂向我們伸出，似乎要把我們都攬進她偉大的愛心裡，那使我們覺得是真正回到了家裡……但是，存留在我腦海中，一直不曾讓歲月沖淡的，却是一個女性美好高潔的靈魂，所有真實、優美與善良都包容在她的愛裡，這些氣質形成了一個不朽的靈魂，它們是永遠不會失落，也不會毀滅的。」

在他們十五個月的休假期間當中，魯斯一家與馬可密克夫人經常見面，她想讓亨利與她同住，做她的義子。可是經過一起禱告，尋求神的指引之後，亨利的雙親覺得必須把他帶回中國。一直到十六年後，馬可密克夫人去世為止，夫人一直是他們的恩人，對他們的傳教工作和子女的教育都捐獻、貢獻良多。

一九一一年，老魯斯太太描寫他的「小魯斯」說：「他真是個十分奇特的孩子！他竟然對著一份新的『耶魯學報』沉思，並且一直想設法知道，一九一五年之時的入學考試會是怎樣的，因為他希望在那一年入學。有人給了他一些試題樣本，而昨天，我發現他竟然在做一份法文試卷，這豈不很有趣！因為他到四月才滿十三歲，所以我告訴他，目前最好還是『忍著點』，別去想將來的考試吧！」

老魯斯太太，對於她的長子魯斯，自懷襟以來所顯現出來的早熟跡象，感到很有意思。小魯斯四歲之時，在聽過教會裡的長者們，一連串滔滔不絕的星期日佈道之後，竟然對著媽媽，開始口述他自編的佈道詞。聖經的音律節奏，深深地吸引了這個孩子。小魯斯對於一種叫做「靈問」的家庭遊戲十分拿手，這遊戲是由根據聖經而作的「二十問」變化而來的。由於魯斯的要求，從司空朗頓家鄉所寄來的聖誕禮物裡，有一本「美國修訂標準聖經」，成套的莎士比亞和維多利亞女王時期小說家的作品、錫製玩具兵，以及一套西洋棋。雖然魯斯不是什麼下棋天才，可是他下棋時極為專注，有時也能擊敗比他好的對手。當他去唸預備學校之時，往返途中，都帶著一付可以摺疊的棋子；有一次，他竟與激烈地地下了一場持續二十個鐘頭的棋。八歲之時，他曾接受扁桃切除的手術，手術未完，而麻藥效力已失，此後不久，他便有了結巴的毛病。老魯斯太太每每把他的結巴，歸之於這次手術所造成的傷害。

除了網球之外，魯斯對於運動興趣缺缺。他是個愛好研究軍事歷史的人，常常在育嬰室的地板上，用錫製的玩具兵和積木，重演著名的戰役，追得兩個妹妹，艾瑪維兒（她的中文名字是梅花）和伊麗莎白（桃花），有好幾天的時間，不得不小心地走在育嬰室的邊邊上，以免弄亂佛吉堡或滑鐵盧戰役的精確佈陣。教會四週的平地長滿了高過人頭的蘆葦和粟草，並且滿佈著佛教徒的墳崗，因此提供了一個可以倣更生動逼真的戰爭遊戲的極佳地點。教會裡的孩子們，總共大約有十二個，分組成兩支軍隊——「浴血三角軍」，是由三周年紀最長、個子最大的男孩所組成；「狂獅吼軍」，由所有其餘的孩子所組成，這支「軍隊」的戰略，便是由小魯斯策畫。

魯斯對於他周遭的環境，有無休無止的好奇，對於中國街道上喧鬧的生活十分著迷，他搜集

了好幾百張的圖畫明信片，上面描繪著當地人們買賣、服飾與交通工具的情形。他是一分男孩雜誌「聖尼古拉斯」的忠實讀者，十歲之時，他寫了一封信給這個雜誌。

親愛的尼古拉斯：

我是一個住在中國的男孩，我住在離縣近郊，在一個大約兩條街那麼長，圍有圍牆的大宅裡。這裏有八家住屋，一所男女混合的學校、一所學院、一個大教堂，和兩家醫院。中國木匠和泥水匠正在建造一幢新屋（這房屋是我們要住進去的）。

大概需要八個月的時間才能造好，這是多麼久啊！中國人沒有鋸木廠，每塊木頭都得用手工來切鋸。

我想你很好。

你真誠的朋友和讀者

亨利·魯斯

如果說，他的熱誠超越了他的年紀，那麼他在離縣生活的那段日子就給了他很大的啓示。在那個教區裏，大約住了有五十名西方人，和兩百名中國學生，教區四週圍有高十二呎的石牆，到了晚上，唯一的一扇門就要栓上，並派人守衛，以防宵小滋擾。牆外遠處是危險之地，有強盜和出沒無常的土匪。圍牆門邊有簡陋的房屋，外出巡遊的傳教士，若是從流行瘟疫的村落裏回來，就在這裏被隔離，有時候，一隔離就是好幾週。一種魚口疔的疫病週期性地蹂躪著山東省，班